



## 晚明福建瓷器窑业的发展

陆明华 (上海博物馆)

明代晚期,福建地区的制瓷业突然有很快的发展,一些地区的窑场如雨后春笋陆续涌现,如德化、漳州等均是在这时期取得发展的白瓷和青花等品种的重要窑场,另外还有许多烧造青花瓷的窑场等,都在生产着可供出口的产品。是什么原因促使当地窑业有如此迅速发展呢?本文就这一议题,探讨一下明晚期福建地区瓷业的发展过程,同时对明代漳州、德化窑的早期烧造情况作一探索。

### 月港开放与瓷业发展的新机遇

20世纪90年代初,福建地区发现了传统所说的漳州窑,出土了许多标本和窑具。笔者曾专程前往福建参观考察,见到了许多米黄釉和青花等瓷片,对之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前往德化等地区考察当地烧造的明清白瓷,但未能取得进一步认识,在当地没有见到生产与传世那种所谓“中国白”产品相同的明清白瓷烧造窑场。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德化窑明清白瓷窑场也被发现并进行了发掘,外销国内外市场的那种白瓷终于有了比较清楚的烧造面貌。福建地区晚明时期烧造青花瓷器的有闽中和闽南的德化、平和、华安、漳浦、安溪、永春、南靖等县的瓷窑,还有闽北地区的窑场。在有的地区里,窑场众多,分布密集,产量相当大。透过这些瓷窑的烧造情况,可以得知明晚期的福建地区窑业发展十分兴旺,对外贸易也十分红火,一时间,这里似乎已变为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心。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福建一些地区的窑业在宋元大发展以后,经过明代长时间沉寂后又骤然发展,这样的大发展起自什么时候?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烧造的主流是青花、米黄釉、白釉瓷,还有曾被称为“汕头器”的五彩瓷等,所有这些瓷器的风格,与传统宋元时期的青瓷和青白瓷风格迥然不同。这是一些新的品种,它们的大量烧造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当时的历史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说到底,这些窑场的烧造,与

漳州月港的开放有最直接的关系。毋庸置疑,明代晚期福建瓷业的发展离不开月港的开放,如果没有月港的开放,晚明时期的福建制瓷业肯定不会如此繁荣。

值得提到的是,在福建许多窑场大量烧造瓷器之际,临近地区的贸易瓷也有广泛烧造,如距离福建南部最近的广东饶平县就有不少青花瓷窑场,其最早的产品也可上溯到明代。最突出的是江西景德镇的民窑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万历中晚期后,景德镇御器厂基本上停止了烧造,这给予当地民窑业带来了新的契机,以后,这里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不说其运输的海港就是福建月港,仅从广义上的外销瓷烧造和对外贸易来说,也首先应该归结于海禁政策解除带来的发展机遇。曾有这样的记载:“瓷器自饶州来,福州乡人自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平。近来月港窑仿烧饶州而为之,稍相似而不及其雅……。”这是晚明时期景德镇瓷器运往东南沿海的月港外销的重要证据,当时进入福州以后的景德镇瓷器,主要是为了输出海外,转运的目的地应就是月港,进入安平的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关于月港开放的历史情况,国内外各方面的学者在论著中有许多描述,有关陶瓷研究方面也见有提及但议论得不多。我们知道,明代中叶以后,福建漳州的月港迅速崛起,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重要港口。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明确宣布,月港对外开放,准许对东西洋进行贸易。以后,为了防止无引私贩偷漏检查,朝廷批准在月港设置海防馆与海澄县治,掌管民间航海贸易。这里成为中国民间商船请引、集中、盘验放行的唯一合法出航点。

这是晚明时期官方首次公开设立贸易港对外开放。实际上,当时的做法也是不得已的,可以说,月港的开放,是官府与民间海上力量激烈较量后妥

协的结果。除了漳州、泉州以外,其余地区的海商没有被获准进行海外贸易,这使得原先就猖獗的走私活动更加泛滥。而作为一个开放的贸易港,月港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地区,商人可以自由出洋进行贸易,这里,“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之皆海供酬酢之,皆夷产。”同时,这里的造船业也有很大发展,能够建造大型航海船只,据记载,其时所造之“舟,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如此规模的大船,可在海上航行自如,对当时的开放和加大海外贸易的力度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看到,月港的开放是明朝的一个重要决策,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当然,最大的受益者是朝廷。万历四年(1576年),月港的关税收入已超过万两白银;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可能超过264000两,其关税收入达到了29000多两白银,有人戏称月港是“天子之南库”。确实,这里已成为一时的全国对外贸易中心。

就陶瓷业而言,国内长期的闭关自守无法使明代瓷业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而张居正执政后奉行的相对开放政策无疑使部分地区窑业找到了新的出路,贸易陶瓷给本行业带来了无限商机。在国内陶瓷业中,福建的窑业处于一个最有利的地位,尤其是距月港不远的地区,无须像内地窑业那样把笨重的、成吨成吨的瓷器,经过长途跋涉运到这里,再辗转贩运出口。当地窑业可以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烧瓷窑场,烧成瓷器可以便利或相对便利的运销海外。可以认为,月港的开放,极大地刺激了福建地区的制瓷业,人们可以就近在贸易港附近置窑兴工(至少漳州地区的窑业可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生产迎合外国人需要的瓷器,通过月港这一通商口岸,扬帆远航,直接或转口运往亚洲、欧洲甚至非洲和美洲。前引文献提到的“近来月港窑仿烧饶州而为之,稍相似而不及其雅”,正是明确指明了月港地区就有仿烧的窑场,这样的瓷窑,几乎节省了瓷器在国内运输的全部费用,这是当地窑业非常适合时宜的做法。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想象福建窑业在万历、天启时期的发展过程。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有着悠久的制瓷传统,也有宋元瓷器外销的传统,两百年的海禁政策,一旦放开,就如江河入海,奔腾激越。

据认为,明代中晚期,福建漳州等地已具备烧造青花、黄釉等品种的基础。到明代晚期后,准确的

说应是万历到明末清初,烧造规模扩大,不少地区窑场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其主要原因就是月港的开放。当然,月港的开放还是有限度的,其自然条件不是十分优越。明人张燮说:“海澄港口,旧名月港。隆庆六年奏设县治。此间水浅,商人发舶必用数小舟曳之,舶乃得行。”月港的泥沙淤积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没有厦门港优越。当地又被政府严加控制,民间航运业可能难有大的作为,以后逐渐被厦门港替代。据认为,在明代晚期,除了月港大量运输贸易瓷外,以后还有厦门港、安平港、福州港等都陆续外销瓷器。

明天启二年(1622年),朝廷“以有事红夷,遂严海禁”,中国商船就此被禁止对外贸易,随着澎湖、台湾先后被荷兰殖民者占据,正常秩序受到破坏,遂使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与海寇商人活动在天启、崇祯之际得以泛滥。月港的合法贸易在走私贸易规模化的浪潮中被毁。红火了许多年的月港,在天启年间,终于走向衰落。当然,月港的贸易地位虽然被摧垮了,但是,已经蓬勃发展的福建窑业显然不会在短时间被毁坏,许多窑场依然在生产着外销瓷器,人们通过其他途径进行着海外贸易,大量福建瓷器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外的许多地区。

#### 明代漳州窑与德化窑的早期烧造

事实证明,月港的开放促使当地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月港开放,福建成了全国对外贸易的前沿阵地,而福建的烧瓷窑业也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因此可以认为,福建不少地区的青花瓷、漳州的米黄釉瓷、素三彩和德化的白瓷等,绝大多数都是这以后的产物,这不能不归功于月港的开放带来了窑业兴旺的景象。如果说月港开放是明代福建窑业振兴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在月港开放以前这些品种是否已经存在?其烧造是否已有较大规模?就这个意义上说,重新评估福建地区的青花瓷、漳州的米黄釉瓷、德化的白瓷等品种的早期烧造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传统意义上的漳州窑据认为始烧于明中期,清末有文献记载:“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烈。旧漳琢器虽不及德化,然犹可玩。”漳州米黄色瓷历来是当地窑场的代表品种,且在始烧年代方面几乎没有疑问。

如上海博物馆藏有明漳州窑米黄釉佛像一件(图一,1),底有细刻“大明成化丁丑口浦东宁乡”等字样(图一,2),经查,成化朝并无“丁丑”纪年。



1



2

图一

由于窑渣原因,“浦”字前一字无法看清,但可看到左边的“三点水”,推想可能就是“漳”字。过去,人们都相信(包括笔者在内)此像的烧造年代可能是成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笔者曾为了此佛像专程前往福建漳州和漳浦调查考察漳州窑,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当地文博部门明确告知无窑址发现。从目前发现的漳州窑落款相似作品看,佛像制于万历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漳州窑释迦



图二

像(图二),人物形制、莲台、须弥座等均与此像基本相似,底刻有“开元寺”、“大明万历乙卯年”、“漳州府东溪乡”等字样。按万历乙卯为万历四十三年,即1615年,这两件作品应是同时期烧造。另外,2009年春,笔者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库内也见到一件类似的万历漳州窑米

黄釉纪年佛像。

据统计,明清时期的漳州窑窑址,“分布于平和、华安、南靖、诏安等地,在云霄、漳浦等地亦有发现。烧造的瓷器以青花瓷为大宗,还有青瓷、白瓷、色釉瓷(如蓝釉、酱釉等)、彩绘瓷”<sup>⑩</sup>等。通过对平和县的碗窑山、洞口窑,诏安县的秀篆、朱厝、官陂窑,漳浦县坪水窑,云霄县火田窑,南靖县梅林窑等窑场的考古调查发现情况看,“大致推断漳州窑以上这些窑址的年代在明晚期至清初,(即大致为明万历至清顺治),约为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前半期”<sup>⑪</sup>。

还有,1994年至1995年发掘的平和南胜、五寨窑是值得予以关注的瓷窑,通过对南胜花寨楼窑、五寨大垵窑、二垵窑三地的发掘,它们的年代大致为明晚期至明末(即明晚期至崇祯时期)。

另外,1992年发现的平和田坑窑也是一处十分重要的瓷窑,田坑窑是一处烧造素三彩瓷器的窑场,这里出土的许多三彩制品十分新奇,在日本有许多传世作品,特别是瓷盒,可在这里找到相同的标本。当然,这里还有青花和白瓷产品烧造。在窑址中,发现有“万历通宝”铜钱,还发现“甲子乙丑”款白瓷残钵,有关专家认为这件“甲子乙丑”文瓷钵,当以“天启四年”较为合适。据此可推断:田坑窑场开始烧造瓷器的年代应稍早于1624年,而该窑的废弃年代显然要晚于1624年了”<sup>⑫</sup>。



根据以上材料来看,漳州窑的烧造年代较难肯定早至明中期的成化,当然,曾见有私人藏品中有嘉靖纪年的器物,但未见实物。因此,以前通过文献和对传世文物的观察,得出的漳州窑始烧于明代中期的结论依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对于德化窑的白瓷和青花瓷器,目前还没有早于万历时期落款的器物,已有的传世德化窑白瓷中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大明成化年制”款的作品均为后仿之作,上海博物馆藏有这样的白釉香炉(双方栏款)。2001年,德化甲杯山窑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出土了几十种不同形制的器物,“这些出土器物中,有不少是与国内外的传世品相同或相似的,说明甲杯山窑址的产品曾有外销<sup>⑩</sup>。”但由于没有发现关键性的纪年证据,因此目前也无法把明代甲杯山窑的烧造时间更予明确。2008年,中国古陶瓷学会福建年会兼泉州中国古代外销瓷



1



2

图三

研讨会期间,笔者参观考察了德化甲杯山窑,也看了泉州、德化等地博物馆的许多窑场标本,对明末清初的德化白瓷面貌有了新的认识,但是,从目前的考古情况来看,距离完全搞清明清德化白瓷的基本面貌还需要做更深入细致的工作。

当然,从传世品看,德化白瓷最晚在万历早期烧造是没有问题的。

刻写有万历年款的器物在传世品中可以见到,馆藏有纪年德化窑白瓷炉一件(图三,1),器上有“永春县民康乡鸣琴里际愿坊李厝垵保信士陈口万历八年六月初一日就于景村宫许下香炉银五分祈庇牛只具旺万历十一年八月吉日谢。”黑彩文字(图三,2),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烧造的产品。

现有地方资料反映,永春县在民国时期尚有民康乡,后分别划分各乡镇,有现属桃城镇的原城郊乡部分区域,还有五里街镇、蓬壶镇、吾峰镇、苏坑镇等地的局部地区,均曾属民康乡。而景村宫为重

要历史古迹,地址在永春县五里街吾东村龙头。据地方人士介绍,早在元末明初,陈伯起为避难从仙游县来到永春县,居住于十九都民康乡鸣琴里,先前来此居住的有张、滕、卢、朱诸姓,陈氏与他们共同开发此地,并在景村宫主祀武安尊王(唐代张巡),还奉祀三代祖师、神农大帝等。景村宫曾于1962年及1984年两次重修。这里还有不少对联留存<sup>⑪</sup>。据介绍,永春民康乡陈氏是一个华人大族,现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后裔,其发展历史有确切的文字可考。定烧德化窑香炉的主人是一位务农的陈氏族人,定烧这件瓷器只是为了“祈庇牛只具旺”。且不深考陈氏和定烧用途,单从其年代来看,此器就可能是德化窑最早的纪年作品。如果说,德化“中国白”瓷器的烧造上限迄今还不明确的话,那么,万历十一年是一个十分明确的时间节点,至晚在万历早期,这种瓷器在德化已有一定数量的烧造。同时,通过对这件作品的研究,或可认为,当时的永春窑青花也许还未开始烧造,不然,永春县民康乡的陈氏也有可能会选择当地的窑场定烧这样的瓷器。因为德化窑离永春县民康乡不太远,但永春湖洋镇碗窑和碗窑坑等窑可能距离更近。当然永春的人也可能会专门去德化定烧瓷器,因为邻县之间过往也较便利,而且德化白瓷的烧造质量远远高于永春窑产品。已委托英国大英博物馆管理(原存伦敦大学)的大维德基金会藏品中有一件康熙纪年款德化窑白瓷罐(图四),纪年为康熙二十三年,即1684年,定烧者是永春人。

万历款德化“中国白”瓷器目前发现很少,天启款器同样不多,但能找到相关的作品,如河南新乡市博物馆所藏一白釉观音像,底座



图四

内壁有“天启年”落款。可以认为,万历和天启是明代德化窑白瓷的盛烧时期。当然,明末清初均可认为是德化白瓷的发展时期。大维德基金会藏品中,有一件造型与上海博物馆藏天启四年德化窑白釉青花款瓶完全相同的作品(图五),器身用褐彩书写“崇祯己卯十二年十二月立”。崇祯己卯为1639年。

馆藏德化窑这件青花款瓶早已为人们熟知,主要是作品用钴料书写了绝对纪年,器身书:“时明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十六字(图六)。这件作品一直是德化窑白瓷和青花瓷研究的一个重要辅证,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上面的确切纪年证明



图五



图六

德化青花瓷烧造的时间,这是目前最明确的德化青花瓷纪年作品。

“赛谢”在古代文献中时常出现,历史文献早有记载:“十一年亲祠后土,为祈穀,自是神明昭格,累年丰登。有祈必报礼之大者,且汉武帝祠睢上,前后数四,伏请准旧祀后土,行赛之礼,上從之。其年十一月,至寶鼎,又亲祠以申赛谢<sup>⑥</sup>。”此语后来成为祭祀典礼常用术语,有的文献解释:“赛,今俗报祭也<sup>⑦</sup>”。古时有赛祠,为谢神祭祀所设,又有赛社,秋收之后以酒食报祭田神。又“岁十二月索鬼神而祭祀……今赛社则其事尔,今以岁十月农功毕里社致酒食,以报田神<sup>⑧</sup>”。馆藏德化窑纪年青花瓶作于秋天,当是“农功毕”行祭前定烧。前述万历十一年白瓷炉的为“祈庇牛只具旺”而“谢”之内容,亦与此相同。这种内容也应是南方福建一带农家祭祀的专用名称。

关于德化窑青花瓷器的烧造上限,过去有正德说和嘉靖说,当然还有笼统的明代说。正德说的依据是1983年福建德化出土的正德己卯年郭真墓志,据认为墓志铭文是用钴料书写。但有人认为此说不实,是在米黄色釉下用酱彩写成,因此不属青花,且同墓出土青花系村民上交,属明末清初之物<sup>⑨</sup>。

至于嘉靖说的依据,也是一件乳白釉青花瓷墓志,墓志纪年为嘉靖己未(嘉靖二十年,即1541

年),被认为是德化县最早青花瓷器。从图中看,应是钴蓝书写的文字,如果来源可靠并可确定是德化产品,这应是最早用青花料书写的德化瓷器。有研究者说明问题而引用地方志说“瓷器色白而带濁,昔时只作粗青瓷,近而制花,又更清,次于饶瓷”作为旁证<sup>⑩</sup>。目前看来依然只是一种推测,安溪虽与德化邻县,要肯定嘉靖是德化青花的始烧时期,需要的是更清楚的证据,此文献没有明确当时是否烧造青花瓷,因此有待进一步肯定。当然,如果安溪明嘉靖五年墓出土的三件青花瓷碗能肯定是嘉靖五年墓出土<sup>⑪</sup>,同时肯定属福建烧造的话,那么嘉靖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但是,从德化青花和白釉窑场考古情况及当地专家的论述分析,目前无法肯定早于嘉靖朝,也许是还没有发现嘉靖时期的瓷窑,目前无法确定。当然,嘉靖朝已烧造青花瓷的说法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但不管如何,德化地区白釉瓷器烧造的兴旺期是万历朝,延续到天启,清代继续发展,青花瓷器的烧造兴旺期晚于白釉瓷器。准确的说,月港的开发给予德化窑很好的发展机遇,开辟了非常良好的国际空间,找到了十分喜爱德化白瓷的欧洲消费市场,从而使德化窑的发展更加蓬勃兴旺。

总而言之,无论是漳州窑的米黄釉瓷还是德化窑的白釉瓷和青花瓷,从其起源或早期烧造到发展都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而这种起源和发展实际上也可清晰看出,在最初阶段,这里是纯粹的民用窑场,从出现到先期烧造都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但到了隆庆和万历乃至天启时期海外贸易浪潮风起云涌的年代,这里主要是生产外销瓷,其窑场生产的规模和销售也是以海外市场为主。而漳州窑青花则十分明显的是开放的直接产物,“漳州窑与德化窑两个系统青花瓷生产的始烧年代大致相当。但是漳州窑在始烧年代后不久,即在明万历至明末清初就进入青花瓷生产的高峰期,而德化、安溪一带的德化窑区域,至今尚未发现与其始烧年代相当或者稍后的规模化生产青花瓷的窑址。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德化窑窑址,是以乳白釉瓷器(即“猪油白”或称“象牙白”)为其主要产品<sup>⑫</sup>。”可以认为,漳州窑的米黄釉瓷和青花瓷(还包括那种所谓的“汕头器”)以及德化窑的白釉瓷,是万历、天启以至明末的生产主流,而这一切,与新航线开辟以后海外对中国瓷器的大量需求有很大关系,同时还与当地悠久的制瓷传统有密切关系。但是归根结底,其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可能就是:当时的窑业

受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所主导,直接的说,港口开放是导致这些窑场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注释:

冯先铭:《中国陶瓷文献集释》引明《安平志》卷四,物类志,手抄本,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0年。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

(明)张燮:《东西洋考》小引。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

黄鸣奋:《厦门海防文化》,鹭江出版社,1996年。

叶文程:《福建地区青花瓷的生产与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三辑。

《明熹宗实录》。

冯先铭:《中国陶瓷文献集释》(引清光绪十二年郭柏苍《闽产录异》卷一,货属),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0年。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精华大全》图830,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⑪、⑫ 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⑬ 林恭务、郑辉:《平和田坑窑及出土素三彩瓷器的初步研究》,《交趾香盒——福建省出土遗物与日本的传世品》,日本茶道资料馆,1998年。

⑭ 栗建安:《德化明代窑址的发现与发掘》,《2002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⑮ 韩松:《泉州市寺庙宫观楹联选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⑯ 《旧唐书》卷二十四。

⑰ (明)张自烈:《正字通》。

⑱ (宋)高承:《事物纪原》。

⑲ 傅宋良、孙艺灵:《论德化青花瓷的产生与发展》,《福建文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6年年会专辑》。

⑳ (明)嘉靖《安溪县志》。

㉑ 叶清琳:《略述安溪纪年墓和带款识几件外销瓷器》,《福建文博》1993年第1、2期合刊。

㉒ 栗建安:《从考古发现看福建古代青花瓷的生产与流通》,《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三辑。

(上接第117页)

期出版的研究报告《13~14世纪的琉球与福建》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与成果。已发现的元代新安沉船与福建沿海南、北航道的宋元时期沉船,结合福建、东亚、东南亚古遗址的考古资料,证明福建在宋元陶瓷外销历史上因为那条横贯福建北、中部的闽江,水运便利,闽江口交通南、北方向,福州港作为闽江的下游城市,是各地商品的集散地与消费地。此外,福建泉州港早在唐代就沟通东西方贸易,同时又是几朝中央政府管理海外贸易的行政机构——市舶司的所在地,更加促使善于造船、航海、经商的众多福建人跻身制瓷行业,福建元代生产的外销陶瓷品种的存在,使得人们重新认识福建陶瓷漂洋过海的实力,能够在“海上陶瓷之路”上与龙泉窑、景德镇窑的陶瓷外销平分春色,为后起更甚的明、清直至今日的对外贸易奠定了雄厚基础。

发现七百年来无人知晓的新安沉船,好比在黑暗中开启了时间隧道。今日海洋考古的发现,发掘海底沉船留下的诸多秘密,传达陆地遗址无法提供的更多信息,各国新生的水下考古力量探索制造沉船灾难又保存文化遗产的海洋,再现先人们征服大海的同时又付出沉重代价的史实。

本文由福建博物院栗建安研究员配图

参考资料:

韩国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新安海底遗物——综合篇》1988年。

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部、文化财厅:《The Shinan Wreck》2006年。

福建省博物馆、茶道资料馆:《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窑出土天目 日本传世の天目》,1994年。

赵嘉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外销瓷——中国水下考古工作与发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栗建安:《南平茶洋窑出土的黑釉茶碗》,《福建文博》1997年第1期。

栗建安:《福州地区薄胎酱釉器的初步研究》,台湾鸿禧美术馆:《陈昌蔚纪念论文集 陶瓷第二辑》,2003年。

王慕民、张伟、何灿浩:《宁波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史》,海洋出版社,2006年。

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森达也:《日本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故宫文物》,No.311 2009年。

谷晃:《日本对中国制茶罐的分类与受容》,《福建文博》2001年第2期。

⑪ 韩国留学生宋永恩翻译有关新安沉船出水木牌的韩文资料。